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一辑）

Abriss der universal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

〔德〕韦伯（M. Weber）著 周咸堂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经济学（第一辑）

Abriss der universal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

〔德〕韦柏（M. Weber）著 周咸堂 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 / (德) 韦柏 (Weber, M.) 著; 周咸堂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58-6

I. ①世… II. ①韦…②周… III. ①经济史—世界 IV. 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520号

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58-6/F.353

定价: 88.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于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德」韋柏 (M. Weber) 著 周咸堂 譯

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初版

譯者序

作者馬克思威培 (Max Weber, 1864—1920.) 是二十世紀初葉德國最偉大的哲學者，社會學者及經濟學者。本書的原名為 Abriss der universal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出版於一九一三年四月。美國伊俄華 (Iowa) 大學教授那宜特 (Frank H. Knight) 的英譯本，題名為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出版於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黑正巖博士的日譯本，題名為社會經濟史原論，出版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譯者根據的是英譯本，但借助於日譯本的地方也很多。

我很早在三年前，就決意要翻譯一部比較綜合的經濟史。此處所謂綜合，不是方法的而是史實的，經過了我個人長期的可能鑑別及指導教授與同趣友人的介紹後，除了本書外，找不到一本比較滿意的著作，更說不上唯物史觀的綜合經濟史。這只有期待着蘇聯的經濟學者。以前的經濟史著作，大都是國別的，地域的或種族的，一般是歐美的，代替了世界的。關於文化淵源最深，土地人口最多的亞洲，或是付之缺如，或是輕描淡抹。固然，關於這一類的文獻少是一個原因，然而世界的學者不注意及之，又是一個大原因。本書可以少補足這一個缺點，這是我翻譯這部書的動機。

翻譯工作開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完成於同年六月，中間雖因困難及其他工作少停，但主要的還是翻譯本

書，所以先後賠費去了半年的時光，這在我個人的研究過程中是值得紀念的。

本書的價值及翻譯的文句，希望讀者認識之，批評之，最後要向讀者道歉的是有些弱小民族的用語及專門術語不能音譯或意譯的不得不插入原文。

一九三三年七月東京

英譯者序

在德國的社會思想界中，自西摩勒爾（Schmoller）以後馬克思威培（Max Weber）差不多是最特出的名字。最近的觀察，發見他在德國是最被人引用的社會學家（參照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美國社會學雜誌四六四頁。）有一個時期，英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的主力，要將經濟思想，從一般的演繹說轉變到方法論的三角形的。例如在一方面，爲心理的及歷史的說明，在他方面，爲統計的研究。這有充分的理由對於英文的讀者去利用威培思想的最後產物，他的經濟史。威培雖不像這部書的德國編者之觀察，以爲他是經濟史界的一位專家，但這部講義的一個豫備過程，在一般經濟史中，供獻一個特別機會，在適度的範圍內，去完成并實現經濟生活的主要概念說明，并改變之。他之聞名於國外，一如其聞名於本土。

這部英譯本的準備，爲的一般的讀者及社會科學的學生們，還有一些是原文中明顯刪去的再編者的性質，但是一些爲德文編者所拋棄的好像是適當的。省略了德文編者所準備的高尙的學術介紹底觀念的定義（Begriffliche Vorbemerkung）。特別在第一章內，有數處是從腳註移到原著的本文中。其他的腳註，省略的省略，縮短的縮短，併且大量的書目提要引註，包含着許多的德文著作及條項，在英譯本中，減到了極少限度。這些都引證於馬克思威培的其他著作中。此中有一些是用德文及法文寫成的，所有其餘的註解，都羣集於卷末。

去測量如此廣大及博學，然而又是簡略的知識界底的一個翻譯工作，錯誤容或難免，極願注意於讀者的批評。明顯的在討論中世紀立法的一段內，歷史的精確性，在某一種情形下，缺少廣大及長久的處理是不可能的，並且許多意志表示的範圍及暗影，在最初是不清楚的。況且有許多事實的處理，在英國的歷史上，不用緊接并行法；有許多術語的使用，在英國的習慣上，不用緊接平等法。特別自從基於光輝的說明，較優於其詳述的精確底這部含有深意義的著作出版後，由他所用的廣博術語，給我們以常識，並且不致進到冗長的說明及比較中。在習慣的許多點上，我從前的老師吳施（A. P. Usher）他在經濟史的範圍內，很和藹的答覆問題，並給我以有價值的勸告及建議。——最後這對於許多的讀者，也許是一個暗示，可以利用之去說物質的真正利益，及作者所說的含有深意義的，讀了這部書可以增加進步。最後一章，總集了威培的資本主義文化史與宗教之關係的名論。

Frank H. Knight.

德國編者序

此處馬克思威培的講義是在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底題目 (*Outlines of Univers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下，於一九一九——二〇年冬季一學期對於學生的公開演講。因為這種工作，他對於學生的緊急請求，克服了他的不願意，因為他已決定將他的興趣，完全的集中及盡瘁於偉大的社會勞動。但是當他允許後，他用其全付力量及人格的無限熱情，——他的特性——置身於這種工作中。這是他所允許完成的最後一班學生。在他第二次行程中間，於國家的政治及一般原則的題目下，這他開始於一九二〇年夏季一學期，他即行死去。

如若威培再多活幾年，他決不發表他的經濟史。最低限度，就是發表，也不是現在的形式。依之他所說的證明，他以爲這種工作是臨時的，有不少的缺點束縛着他，如同一切的偉大學者，他他本身的最切實的批評者。問題就這樣的放在芙蘿威培 (*Frau Weber*) 的身上，並且編者也是由她選定的。由他們答覆了出版的全部承諾，在很大的猶疑後才決定之。他們被說服了科學對於馬克思威培所要求的這種著作。這部書的重要，併不在其詳細的內容——馬克思威培不是一位專家，併且專家們在這部書中，一定要發現許多反對的意見——乃在其根據分析經濟生活的方法之概念的透徹。這種方法，適合於說明其豫備期及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併且在綱要的

技巧上，這種研究的結果，對於這個觀念是有用的。

恰想像到這種地位，是置之於編者的困難任務之上。威培併沒有手稿，甚至也沒有首尾一貫的大綱可以利用。僅在他的文書中，發見了一捆筆記，這還不如用於筆記中的接字之多，甚至對於這些接字，都是難懂的。結果，由學生們很願意供給他們的筆記的數月中復舊了原文。應當先感謝他們，因為如此，才能以在馬克思威培的名字下，貢獻世人以經濟史。編者在這種說明過程的意義上，得到成功。不幸的是幾乎完全的失却了這種有力而生動的語氣表白，這好像僅能夠出現於不完全及不明瞭形式的筆記中似的，並徒勞了在復舊中的一切努力。要想避免由他人之手，以變動這部書的形式，好像是不可能的。編者曾想到一個少許較完善的組織及各不相同部份的聯絡，以致於各段及各小標題，庶可以易讀及易於了解。但無論如何，這在本質上，僅不過是一國保守文獻的使命而已，所以在此處停止我們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是不能強迫之取作者所貢獻材料的地位而代之，進到爭論或企圖中，以除去前進的懷疑，這在他的討論中，是一定要發生的。僅有少許的地方，並且僅是偶然及簡略的，他們贊成去改正作者的明顯錯誤，或努力去完成他的敘述。

S. Hellmann.

M. Palyi.

一九一三年四月於慕尼克及柏林

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目次

譯者序

英譯者序

德國編者序

第一部 家計氏族村落及采邑——均田組織

第一章 農業組織及均田共產主義制的問題

第二章 財產制度及社會集團

(A) 專有的形態

(B) 家族共同體與氏族

(C) 基於經濟及非經濟條件之家族的發達

(D) 氏族的進化

(E) 家族共同體的進化

第三章 領主財產制的起源